

# 政治與學術之間： 羅隆基的命運

• 謝 詠

1957年的政治運動，造成了中國55萬人的右派命運。20年後，中國為「右派」平反。在當時的知名「右派」中只有以下幾位未獲平反，他們是：羅隆基、章伯鈞、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林希翎。除林希翎是年輕學生外，其餘5位均是1949年以前就很著名的知識份子。1986年10月24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舉行紀念大會，隆重紀念羅隆基先生誕生90周年，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閻明復到會講話，對羅隆基一生作了評價，算是用特殊的方式為羅隆基恢復了名譽。他稱羅隆基是「著名的愛國民主戰士和政治活動家」，並進一步指出：「縱觀羅隆基先生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總的來說，他是愛國的、進步的，為我們民族和國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們紀念的。」<sup>①</sup>

1923年，羅隆基、聞一多等人在美國芝加哥成立了大江學會，這是一個以留美清華學生為核心的政治性團體。當年的29名成員中，除了離開大陸的幾位，幾乎全成了「右派」。清華出身的這批人，對政治都抱有熱情。

## 一 出身清華

羅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1913年考入清華學堂，1921年夏天畢業，秋季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1925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後離美赴英，入倫敦大學研究。回國後歷任中國公學政治經濟系教授、光華大學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學政治經濟系講師、天津《益世報》主編、北平《晨報》社社長、《新月》雜誌主編。

羅隆基一生對現實政治抱有濃厚興趣，這使他較早地離開了大學講壇而投身現實政治，也使他終身在著述上不夠豐厚。1923年，羅隆基、聞一多、吳澤霖等人在美國芝加哥成立了大江學會，這是一個以留美清華學生為核心的政治性團體，鼓吹國家主義(nationalism)，以「對內實行改造運動，對外反對列強侵略」為宗旨。當年的29名成員中<sup>②</sup>，如吳文藻、吳景超、吳澤霖、顧毓琇、梁實秋、聞一多、潘光旦等，後來都遠離了現實政治，而走上學術道路。雖然

後來他們各自的命運都很坎坷，除了離開大陸的幾位，幾乎全成了「右派」，但以羅隆基的命運最令人深思。

世紀初成長起來的這批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是清華出身的這批人，可以說對政治都抱有熱情。當年羅隆基引以自豪的是「九載清華，三趕校長」，可以想見青年學子的衝動。當時清華的入學規定是「考生年齡以不超過十四歲為限」<sup>③</sup>。可以設想，當一個不足十四歲的少年在清華這樣的留美預備學堂中呆夠八年之後，他們身上究竟是傳統的影響重，還是西化的影響強？可以說他們是從小即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其中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早熟的自由和民主觀念，這直接表現在對政治的熱情上。羅隆基是將年輕時對政治的熱情一直保留下來的一位。他的老同學浦薛鳳曾說過，在清華辛酉級（即1921年畢業級）同學中，有興趣與能力搞實際政治的當推羅努生、何孟吾與吳峙之三位。浦薛鳳說：「努生有其學識，具其口才，弄其手腕，但他至多是一位自覺得意的政客，而非一位真正的政治家。」<sup>④</sup>1922年春天，浦薛鳳曾和羅隆基直言相互較量性格，並預卜前途。羅隆基說：「逃生，你有你的才識，但只是一個書生，不夠現實。除非你改變作風，恐你成為一位政治理論家而非政治實行家。」當羅隆基要浦薛鳳對他直言批評時，浦含蓄地說：「努生，我只覺得你讀『子』書多於『經』書，你喜歡『法』家甚於『儒家』。盼你將來官運亨通，但慎防宦海風波。」<sup>⑤</sup>羅隆基的最後結局，終於被他的同學言中了。

羅隆基一生對現實政治抱有濃厚興趣，但老同學浦薛鳳曾說過，他至多是一位自覺得意的政客，而非一位真正的政治家。

## 二 《新月》時期的政治言論

1928年，回國不久的羅隆基才30歲。是年3月，《新月》月刊創刊，而「新月書店」亦先後在北平和上海開張。這時羅隆基顯得非常活躍，很快便進入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活動中心。他積極參與了《新月》的活動，先後擔任了《新月》3卷2期至4卷1期的主編。《新月》本來是一個純文學刊物，但羅隆基接編後，陸續登載了不少討論政治問題的文章。這時南京方面延攬過他，胡適曾將戴季陶的一封信轉給羅隆基，從他給胡適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對仕途的熱衷，他說：「惟原函中所謂在院服務，並未言明何項職務，所謂黨校教書，亦未言明何項科目，令人實難答覆。」最後他告訴胡適「何去何從，當以考試院之職位而定耳」<sup>⑥</sup>。雖然後來羅隆基並未赴考試院，但他熱衷現實政治的性格已非常明顯。

《新月》時期的羅隆基著述頗豐，是為《新月》寫稿最多的作者之一，而所做文章都在政治學範圍內產生很大影響。他的言論大體分為兩類，一是以自己深厚的專業知識，介紹英美的政治學理論；二是以自己對政治學原理的理解，來批評政府行為的不合法性。

1929年，羅隆基在《新月》發表〈專家政治〉一文。這篇文章是羅隆基一生思想的重要代表。羅隆基熱衷現實政治，不僅是性格使然，也有很強的理性支配。他信奉「最好的政府是最好的行政」的原則，並明確宣稱，要說政治，「我的座右銘是：『只問行政，不管主義。』」<sup>⑦</sup>羅隆基對中國政治結構的評價是行政比政體要緊，有了好的行政，無論在哪種政體下，人民總可以得到幸福，反

之，如果沒有很好的行政，無論在何種政體下，人民都會遭殃<sup>⑧</sup>。羅隆基關於專家政治的想法來自美國，他當時已經注意到隨着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必然導致政治上的專家政治。羅隆基認為當時中國政治上的混亂，主要問題是出在行政上。具體說，就是行政人員的選拔制度很落後。羅隆基回國不久，即介紹美國的吏治法與吏治院，其着眼點即在如何能將真正有才幹的人選出來。羅隆基認為，中國當時的行政處在武人政治和分贓政治這兩種惡勢力的夾攻下。他又認為，不經過選舉、考試而靠推薦、援引、夤緣、苟且產生出來的全國官吏，是一種分贓制度，所以他力主「要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最要緊的是專家政治」。要實現專家政治，消極方面是要先除去武人政治和分贓政治；積極方面，則是先實行選舉制度和考試制度<sup>⑨</sup>。

《新月》時期，羅隆基發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論人權〉。他指出，人權簡單說就是做人的權利。不過羅隆基的人權觀卻不止於此，他認為衣食住行、溫飽小康固然是人權，但他特別強調言論自由是人權的應有之義<sup>⑩</sup>：

言論自由是人權。言論自由所以成為人權，不因為他可以滿足人的慾望，不因為他是天賦於人，不因為他是法律所許，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他是做人所必須的條件。

是一個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要表現他的思想。要表現他的思想，他非要說話不可。他要說自己要說的話，不要說旁人要他說的話，這就是發展個性，培養人格的道路。

除此以外，羅隆基還分析了人權與國家的關係。他引述一位外國政治學家的話來闡述自己的觀點，認為從政治哲學上立論，國家不是一個強迫人民服從其意志的團體。國民之所以為國民，就是他有檢查政府一切行動的宗旨及性質的責任。政府的行動，不能以其出諸政府，即成為天經地義。簡單地說，國家不能產生人權，只能承認人權。國家的優劣，在任何時期，即以人權得到承認的標準為準<sup>⑪</sup>。說到人權與法律的關係，羅隆基認為法律保障人權，人權產生法律。他亦認為人權有時間性與空間性，因時因地而不同，有時偏重經濟，有時偏重政治。在文章的最後，羅隆基以「我們的人權是甚麼」為題，開列了35條，可以說為中國起草了一個較為全面的人權宣言，這個宣言今天讀來仍然振奮人心<sup>⑫</sup>。

羅隆基還發表了〈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我們要甚麼樣的政治制度〉等文章，直接批評國民黨一黨獨裁和「以黨治國」、「黨在國上」等。他認為，思想不能統一也不必統一。而且以人類的經驗論，自有政黨歷史以來，從來沒有過「黨外無黨」這回事，更沒有過「黨內無派」這回事。政黨本來是與民主政治交相為用，相輔進行的。以民主主義治黨，就不怕「黨外有黨」，民主的功用就在於調劑黨內的派系、黨外的黨，使一切意見主張的紛爭，走上光明正大軌道，而不趨於革命流血一條狹路<sup>⑬</sup>。

此外，〈論共產主義〉是羅隆基在《新月》時期集中闡述對共產主義看法的一篇論文，文中對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從經濟到政治都給予了批評。他在援引

羅隆基在〈論人權〉一文的結尾，以「我們的人權是甚麼」為題，開列了35條，可以說為中國起草了一個較為全面的人權宣言，這個宣言今天讀來仍然振奮人心。



羅隆基(後排中立者)  
從學術走向現實政治，最後被打成「右派」，似乎是那一代自由知識份子無法躲避的宿命。

一位英國教授的觀點時指出，馬克思社會主義是歷史學家永遠的疑團，這種不邏輯的、愚呆的主義，何以能在民眾的心理上發生如此有力且深遠的影響，並且藉由民眾所受的影響而反過來影響歷史自身<sup>⑭</sup>？之後，他又寫了〈論中國的共產〉一文再次闡釋自己的觀點，這篇文章的副題是「為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並建議他們「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統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黨治』」<sup>⑮</sup>。羅隆基在文章中集中分析共產主義何以會在中國壯大，他認為國民黨應負主要責任。第一，國民黨宣傳共產黨的主義。共產黨有今日的地位，共產主義在一般青年的頭腦裏成了時髦，誰也不能否認這是孫中山、汪精衛以及許多國民黨領袖的功勞。第二，國民黨採用共產黨的制度。如今國民黨有黨的組織，其「黨治」的策略，由黨而產生出來的政府，那一項不是師法共產黨、熱衷共產黨、整個的模仿共產黨？第三，國民黨協助共產黨實際的工作。先知先覺的遺教，為共產主義作宣傳；後知後覺的組織，為共產制度造實例。同時國民黨下級黨員的一切工作，又直接間接的為共產勢力實現創造機會。他進一步認為，政治失敗、黨員失德，是一黨政治的必然結果。在一黨專制下，人民沒有組織和言論的自由，亦沒有監督、指責當局及黨員的機會，獨裁政治的結果，自然是專政者的腐化，政治日趨腐化，人民日趨叛離，這就是如今共產黨發展的機會。

整個《新月》時期，羅隆基發表過許多文章，他還用「魯參」、「鹵」等筆名寫過許多書評。綜合來看，這些文章都是圍繞人權、憲政、約法等政治學理論

而寫的，但由於觀點過於尖銳，觸犯國民黨而遭拘捕。他後來寫了〈我的被捕經過與反感〉。

### 三 德不濟才的羅隆基

1933年，蔣介石在四川峨嵋山召見羅隆基，請他講「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國家的戰時行政組織」，可見蔣介石也很賞識羅隆基在行政理論方面的才能。據羅隆基遺稿披露，講課完畢後，蔣介石問他今後希望在哪方面工作，羅隆基坦白地說：「我沒有參加實際政治的才能和興趣，仍願意回南開大學繼續教書並從事寫作。」<sup>⑥</sup>羅隆基的回答使蔣很失望。

然而他對蔣介石的回答，實與其性格不完全一致，因為在羅氏的朋友中，幾乎一致公認他有實際政治才能、對政治活動有真正興趣。然而，他的學生儲安平卻批評他的最大弱點是德不濟才<sup>⑦</sup>。學生對先生如此評價，可見羅隆基的缺點比較明顯。李璜對羅隆基的評價是：「要談實際政治，羅隆基卻是一個人才」，並為國民黨沒有網羅住這樣的「行政好手」而惋惜<sup>⑧</sup>。至於他的缺點，李璜說：「那個時候，老羅正在與他的太太鬧離婚，他太太也是留美學法律的，在上海光華大學教書，對老羅的浪漫，大概管束太嚴，因此兩小口常常打架，鬧得學生們都知道了。」<sup>⑨</sup>台灣歷史學家沈雲龍肄業光華，他談到羅隆基時說：「羅先生和他的夫人張舜琴，似乎琴瑟並不調和，常常雙雙請假，過幾日，便見羅先生面部帶着紗布繃帶來上課，同學們常背後竊笑。這樣經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難維持長久。」<sup>⑩</sup>李璜對羅隆基一生的總結是：「羅隆基是一功名中人，其熱心政治，好出風頭，無非總想當一個部長而已。」<sup>⑪</sup>羅隆基和聞一多是留美的同屆學生，有一次梁實秋和羅隆基去清華看潘光旦，順便也看望了聞一多，梁實秋說：「他對努生不表同情，正顏厲色的對他這位老同學說：『歷來干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謹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倖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當時情緒很不愉快。」<sup>⑫</sup>

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體現在羅隆基身上的矛盾，或許可以視為他同時代知識份子的共同特點。他們在理性上完全信奉西方的民主、法治觀念，並在青年時期以此行事，但到了中年，特別是在捲入具體的政治漩渦中時，他們的行為又違背了青年時期的理想，這是很令人深思的。在1930年11月，羅隆基曾有過一次被捕的經歷，雖然只被扣押了六個小時，但他切實地體會到了在一個「黨治」高於一切的國家中，個人權利的毫無保障。這一次偶然的個人遭遇，或許埋下了他終身對國民黨的反感。羅隆基的政治觀點中對「黨治」的厭惡特別明顯，他對「以黨代國」、「黨在國上」的做法十分不滿。在〈我的被捕經過與反感〉一文中，他歷數在「黨治」底下，以黨的名義任意控告人民，以黨部名義指揮軍警，不經法定手續拘捕人民的種種違法行為，並指出「黨權高於國，黨員高於法」是社會最大的危險<sup>⑬</sup>。蔣介石試圖起用羅隆基時，羅隆基是一個年方35歲的年輕大學教授，他拒絕了蔣介石的羅致，實與這種厭惡「黨在國上」

沈雲龍談到羅隆基和他的夫人張舜琴似乎琴瑟並不調和，常常雙雙請假，過幾日，便見羅面部帶着紗布繃帶來上課，同學們常背後竊笑。

1930年11月，羅隆基曾有過一次被國民黨扣押的經歷，以致他的政治觀點中對「黨治」的厭惡特別明顯。在〈我的被捕經過與反感〉一文中，他指出「黨權高於國，黨員高於法」是社會最大的危險。

的觀念有關。他接近共產黨，是由於它當時的政治地位還沒能將「黨在國上」的觀念體現出來。

#### 四 羅隆基與「黨天下」

1949年，羅隆基留在新政權內，這時的羅隆基已不同於年輕時期。40年代末期，在國共兩黨軍事、政治激烈交戰的年代，他作為第三方面的代表，一直幫共產黨的忙，而當時共產黨為了盡快獲得政權，在民主政治方面曾許下很多諾言，對於民主人士也表現出尊敬和寬容，這些因素對羅隆基的政治選擇可能都有影響。

1950年，他和朋友呂孝信交談時，曾對呂的抱怨解釋說：「我怎知道國民黨這樣不堪一擊？連大江以南也守不住？如果能守住江南，平分天下，共產黨也不致有這樣高的氣焰。」<sup>②④</sup>當呂勸他申請出國時，他說：「你不知道，如申請不准，以後將被歧視，認為思想不良，那份罪可大了，又怎能不怕呢？」<sup>②⑤</sup>可見，羅隆基對自己在1949年的選擇是有所不得已的。

1949年後，羅隆基一直對自己在政治上的才能抱有足夠自信，並曾幻想以自己當年所做的貢獻，可能會成為外交部長或駐英大使的人選<sup>②⑥</sup>。雖然同時代的人公認他具備實際的行政能力，但在對共產黨的認識上，他的書生氣就流露出來了。他渴望成為新政權中的一名閣員、一名部長，但他最終獲得的職位不是外交部長，也不是駐外使節，而是森林工業部部長。以他留美的政治學教育背景，公認的中英文水平，加上出眾的辯才和口才，結果也只能管管木頭。千家駒對羅隆基的評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被任命為政務委員，沒有當上部長，一直牢騷滿腹。」<sup>②⑦</sup>看他在《新月》時期對政治、國家、政黨、民主、自由等的看法，想他在1949年以後的不適應也是情理中事。

1949年，許多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都留在大陸，情況比較複雜。出於種種原因，當時中共對知識份子還表現出一種歡迎態度，再加上國民黨的腐敗已使他們絕望，1948年底，大批知識份子由香港進入解放區。1950年左右，全國的安定局面使他們一度興奮。可是正當他們對新政權產生好感之際，中共卻製造了一個知識份子原罪論的神話——改造資產階級的思想為無產階級的思想，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當時居然相信了這個神話。羅隆基甚至說過：「周總理是南開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華出身的，為甚麼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sup>②⑧</sup>一方面說明他有想不通之處，另一方面則說明當時的社會意識已漸趨以「無」為榮，以「資」為羞了。在新的環境裏，羅隆基的心情並未感到舒暢，而是越來越感到壓抑，他所預想的一切都沒有出現，而他萬萬想不到的事情卻很快發生了。1957年的到來，將這位複雜的、充滿個性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僅剩的一點夢想也打破了。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儲安平以民主黨派成員和新聞界著名人士的身分與會。6月2日，《人民日報》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表了儲安平在座談會上的發言。這篇發言即是著名的「黨天下」論。

羅隆基甚至說過：「周總理是南開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華出身的，為甚麼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

儲安平在發言中首先指出這幾年黨群關係不好，已經成為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何在？在儲安平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他還說：「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黨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儲安平在1957年夏天的言論是婦孺皆知的，但最早使用「黨天下」這個說法的應是羅隆基。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新月》雜誌，第一篇文章是羅隆基寫的〈我們要甚麼樣的政治制度〉。文中批評國民黨「黨在國上」，他說<sup>②</sup>：

「黨在國上」的影響，尚不止這一端。國民黨可以抄寫共產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別的黨又何嘗不可抄國民黨的文章，把黨放在國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劉邦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馬懿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國民黨革命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其他的黨革命成功，當然亦可以說「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繼續不斷的「黨天下」。

說到「黨天下」的說法出自羅隆基，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想到他和儲安平的關係。羅隆基長儲安平11歲。儲安平的經歷與羅隆基大體相似，他從上海光華大學政治系畢業以後，留學英國，思想都受著名的費邊主義者拉斯基(Harold J. Laski)的影響。羅隆基在《新月》前期比較活躍，而儲安平在《新月》晚期比較活躍。

羅隆基曾任光華大學政治系系主任，教授比較政府及政治思想史。1932年，儲安平於該校畢業，是羅隆基的學生。從各種聯繫上講，儲安平與羅隆基的關係應該是很近的，儲的許多思想都直接受羅的影響，但儲對羅是有看法的。1946年9月，儲安平在上海創辦《觀察》周刊，列為該刊「撰稿人」的前後共有78人，多數是國內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但在這個名單中，沒有羅隆基，而且在《觀察》存在的近三年時間內，羅隆基沒有為《觀察》寫過片言隻字。原因何在？是因為儲安平對羅隆基的品德有看法。

1957年夏天，儲安平曾訪過一次羅隆基。共產黨批判儲羅二人時，在《光明日報》發表過一篇〈章、羅和儲安平密室策劃一證〉<sup>③</sup>，說儲安平和羅隆基如何如何，顯然是將一般性的拜訪和交談上升到政治活動中去了。儲安平後來在〈向人民投降〉一文中承認了與羅見面。另外，在當年的民主人士中，羅隆基和毛澤東、周恩來的個人交往是很少的<sup>④</sup>。羅隆基在1957年的遭遇除了政治上的直接原因外，與毛周個人的疏遠或許也是一個因素。因為即使在「反右」、「文革」當中，毛周出於個人情誼或其他考慮，也保護過一些知識份子，如章士釗、梁漱溟等人。在「反右」之前，羅就曾說過：「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對這類自高自大的『士』，亦確有一套領導的藝術，即所謂『禮賢下士』、『三顧茅廬』等等。」<sup>⑤</sup>然而這種聲音在已經獲得政權的人聽來，已經很不順耳了。

據說，在羅隆基成為右派之後，香港曾有人邀他辦報。周恩來為此約見了他，轉告了這個消息，並對他說：「如果你想去的話，隨時都可以去，不論去

1957年6月2日，《人民日報》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表了儲安平在座談會上的發言。這篇發言即是著名的「黨天下」論。但最早使用「黨天下」這個說法的應是羅隆基。

儲安平與羅隆基的關係是很近的，但儲安平在上海創辦《觀察》周刊時，在列為該刊「撰稿人」的名單中，卻沒有羅隆基，而且在《觀察》存在的近三年時間內，羅亦沒有為《觀察》寫過片言隻字。究其原因，是儲安平對羅隆基的品德有看法。

香港，去美國，都可以。我想，你是不會去台灣的。」羅隆基回答：「總理，謝謝你的關心。我哪兒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這裏。」<sup>③</sup>這與他當年對呂孝信說的「如果申請不准，以後將被歧視，那份罪可大了，又怎能不怕呢？」是一致的，作為「右派」的羅隆基還能怎麼回答呢？申請離開，那不是更可怕的事嗎？羅隆基沒有走，1965年他離開了這個世界。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純粹的學人，但他自覺地走上了仕途，一切悲劇都由此而來。書生參政，好像都是這個結局。

### 註釋

- ① 《人民日報》，1986年10月25日。
- ② 聞黎明：《聞一多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頁82。
- ③④⑤ 浦薛鳳：〈憶清華辛酉級十位級友（上）〉，《傳記文學》，第47卷，第2期，總第279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85年8月），頁19、20。
- ⑥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香港：中華書局，1983），頁502。
- ⑦⑧⑨ 《新月》，第2卷，第2期。
- ⑩⑪⑫ 《新月》，第2卷，第5期。
- ⑬ 《新月》，第2卷，第8期，第12期。
- ⑭ 《新月》，第3卷，第1期。
- ⑮ 《新月》，第3卷，第10期。
- ⑯⑰ 葉永烈：《沉重的1957》（南昌：百花州文藝出版社，1992），頁34：70。
- ⑱ 《觀察》，第2卷，第2期。
- ⑲⑳㉑ 李璜：〈談王造時與羅隆基（下）〉，《傳記文學》，第39卷，第3期，總第232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81年9月），頁35、36。
- ㉒ 沈雲龍：〈光華大學雜憶〉，《傳記文學》，第39卷，第3期，總第232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81年9月），頁53。
- ㉓ 梁實秋：《談聞一多》（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頁104。梁實秋在〈羅隆基論〉一文中對羅氏的評價是「才高於學，學高於品」。《世紀評論》，第2卷，第15期，頁10。
- ㉔ 《新月》，第3卷，第3期。
- ㉕㉖㉗ 呂孝信：〈憶一對歡喜冤家——王右家與羅隆基〉，《傳記文學》，第24卷，第1期，總第140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74年1月），頁38。
- ㉘ 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歷》（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92），頁239。
- ㉙ 《大公報》，1957年8月11日，吳晗發言。
- ㉚ 《新月》，第2卷，第12期。
- ㉛ 《光明日報》，1957年7月7日，第3版。
- ㉜ 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和1988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書信選》中，未收一封毛周給羅的信，這在當時的民主人士中是很特殊的。另外孫琴安、李貞著：《毛澤東與名人》（江蘇人民出版社，1953）；盧之超主編：《毛澤東與民主人士》（華文出版社，1993）等書也未列毛羅交往的資料。
- ㉝ 羅隆基：〈加強黨與非黨知識份子的團結〉，《人民日報》，1957年3月23日。

謝 泳 1961年生。山西榆次市晉中師專英文專業畢業，現為山西省作家協會研究人員。主要研究中國現當代知識份子問題。